

我们的节日与节俗

薛冰

回观历史，中国的传统节日与节俗，从来就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节庆的时间会有改变，节俗的内容会有差异，最重要的是，节俗活动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中。节俗当从时代，是历史的规律，也是现实的要求。

节俗，从来就是处于变化之中的。首先，节庆的时间会有改变。比如说正月初一为一年之始，是汉代才确立的。《尚书大传》中说：“夏以孟春为正，殷以季冬为正，周以仲冬为正”，秦代更以夏历十月初一为新年。又如接财神，清代以正月初二为多，而当代则以正月初五接财神最盛行，还有人为了抢先接到财神，在初四就“抢路头”。其次，节俗的内容会有差异。如端午节，南京以西，是纪念屈原；苏州以东，是纪念伍子胥。又如古代由女性祭祀，到明代变为禁止女性祭祀。最初只有送灶君上天，后来又增加了接灶君归位。至于冬至要不要吃饺子，春节吃年糕还是吃面条，更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最重要的是，节俗活动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中。先秦时期，因为人的生产技术水准较低，对自然界的依赖程度很高，将未知的自然力量视为神秘，力图以种种方式与其沟通。祭百神、祭祖先，就是为了感谢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庇护了百姓，希望来年仍能得到他们的庇佑。汉魏以降，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岁时风俗中世俗生活的内容渐渐增加。

即以新年节俗为例，晋代除夕活动的中心已是辞旧迎新。《荆楚岁时记》中说到“相聚酣饮，请为送岁”。家人团聚守岁成为定例，且以为子女守岁能为父母延年益寿，有“守岁爷命长，守岁娘命长”的俗语流传。此后新年节俗不断拓展，将时段相近的一系列民俗活动融汇进来，从腊八、祭灶到元宵，前后长达一个多月。节俗内容也在陆续变化中，如汉代的门神是神荼与郁垒，到唐代换成了秦琼与尉迟恭。同到明代初年，因朱元璋的提倡而增加了春联。元宵节在唐代只有三天，“金吾弛禁”三夜，夜游观灯成为元宵节俗，不会早于唐代。宋代京师增为五夜，明代又发展到十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财神信仰的出现。赵公元帅的财神形象，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出版的《封神演义》中完成的。民间接财神的习俗，实际上是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商品生产和贸易发达，市场经济兴旺，拜金思想渐盛的反映。清代以来，祭拜财神已成为新年风俗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且产生了关于“五路财神”的种种说法。直到现在，正月初五接财神，仍是与初一拜年不相上下的节俗活动。

近年来在重庆节俗中增加敬老的内涵，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同样，清明节俗中也可以考虑增添孝亲的内涵，在祭扫去世亲人的同时，更应注重对在世长辈的孝敬。与此同时，一些节俗内容在消失。如《荆楚岁时记》中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羊。正旦画鸡于门，七日帖人于帐。”以新年某一天的天气晴好与否，占卜相应事物全年的灾祥。至迟在汉末这一风俗已广为流行，并陆续增添庆贺、祭祀、娱乐的节俗内容。但后世渐趋淡化，民国年间，只有人日仍是重要的民俗节日，而现在知道“人日”、“人胜节”的人也差不多了。

过年最热闹的是放鞭炮。但在火药发明之前，爆竹名副其实，就是以火燃竹筒，令其爆裂发出响声。有了火药制造的鞭炮，没有人再去烧竹竿。有趣的是，至今还有人纠结于鞭炮的禁与不禁，以今天的科技水平，制造有声光无污染鞭炮替代品，不会有困难吧？同样的道理，中秋节的月饼，是年年吃、年年怒，为什么就不能放弃旧配方，生产符合现代人口味的月饼呢？

所以说，节俗当从时代，是历史的规律，也是现实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把人们重新捺回既往的生活模式，也就没有理由固守陈旧的节俗。只要大家解放思想，营造更多适应现代人新生活、新情怀、新追求的新节俗，我们的节日就一定能够广受欢迎，迅速崛起。最典型的例子，是“双十一”、“双十二”这种“无影造西厢”的新节，竟然引来全民狂欢。如果一定要说它与传统节日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同样选择了易记易传播的日期。

这种新节崛起给我们的启迪，就是必须打破陈规守成规的旧观念，重塑适应新时代、新生活的节俗，才有可能复兴我们的传统节日。回观历史，中国的传统节日与

在乡间深秋的细雨里与姨外婆分别的时候，我贴近她的耳朵大声嚷道：“再过十个月，我会再来看您，来过您102岁的生日。”

大多数老人都习惯用“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时候”来回关于下一次见面的预约。我的姨外婆不需要那样的悲观，更不需要那样的客套。她轻松地站立在我的面前，用一如既往的微笑看着我。那是充满智慧又充满自信的微笑。那是面向“下一个生日”的微笑。她显然非常清楚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会将她带向哪里。

我总是说好奇心就是生命力。这是姨外婆教给我的人生哲学。我每次去看她的时候，她总是问我很多问题，其中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关于我”的主观的问题，而是她认为我应该知道标准答案的客观的问题：比如她94岁那年，在县城一家书店里买到的那一套《沈从文文集》是不是权威的选本？比如在她手里翻转了三十年的魔方怎么才能拼出所有的六面？比如哪里还能找到更具挑战性的数独？……这不像是个“农村妇女”应该问的问题。这也不像是个“百岁老人”应该问的问题。

我也总是说幽默感就是生命力。这也是姨外婆教给我的人生哲学。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我都会对她在语言上的表现有很高的期待。这不仅因为我一贯喜欢通过语言表达的质量去检测人的身体状况，还因为姨外婆的语言总是带给我巨大的享受，而且是感官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它总是那么简洁，总是那么优雅，总是那么精准……而最重要的是，它总是那么幽默。这好像不是属于一个“农村妇女”的“总是”，这好像也不是属于一个“百岁老人”的“总是”，而我已经是在湖南的农村生活了一个世纪零一年的姨外婆总是用她的语言让我这个以苛求语言著称的写作者顿开茅塞、豁然开朗。在她的面前，我自己的语言也会立刻变得简洁、优雅、精准和幽默。

这一次走到她身边的时候，我首先

注意到的还是她刚刚放下的魔方。这让我为她不屈不挠的好奇心而骄傲。因为我能够活这么久？她说她的眉毛不浓，耳朵不大，长的是“一副败像”，她的长寿完全“不合理”。“阎王爷肯定是出了错。”她用很有把握的语气说。

姨外婆的听力已经很差，而她的视力却好得出奇，因此我们交流的方式通常是她口头提问，我写下回答或者我写下问题，她口头回答。我当然没有能力回答连阎王爷都会出错的难题。于是，我写下了自己对这“不合理”的对策，“这个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这样写道，“您应该学会将就。”

姨外婆笑得前仰后合。但是笑完之后，她变本加厉，说自己的长寿“太不合理”。我们就用这“口头加书面”的特殊平台愉快地交流，话题从物质到精神，从天南到海北。在交流即将结束的时候，姨外婆的长子插话说他母亲现在除了正常的养老金之外还享受百岁老人的特殊津贴，每个月的钱怎么用都用不完。

这关于她经济状况的爆料让我忍不住给姨外婆重新划定成分。“您现在已经变成了‘富婆’。”我这样写道。

被戴上这样一顶时髦帽子的姨外婆又笑得前仰后合。接着，她靠近我的耳朵，悄悄地说：“可惜发财发晚了。”

最老的“魔方”

薛忆尧

姨外婆的幽默回答引得我抱着她一起大笑起来。接着，我又大声嚷着告诉她，以前我只知道出名要趁早，没想到发财发晚了也很“可惜”。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外婆的〈长恨歌〉》的短文，介绍我有着惊人记忆力的外婆。这篇文章后来被包括《读者》在内的许多报刊转载，流传较广。那时候，我的外婆已经是93岁高龄，却仍然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出包括《长恨歌》在内的无数古代文学作品。我称外婆是这个特殊项目上的“中国第一人”（尽管她终身的最高职称也只是“家庭妇女”）。在那篇文章里，我也第一次提到了外婆“长期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妹妹。外婆在97岁的时候离世，“中国第一人”的桂冠自然就应该落到她妹妹的头上。这对姨外婆是当之无愧的荣誉；因为她也大段大段地背诵出许多的古代文学作品；更因为她正在朝着102岁的生日平静地走去，还在继续拔高这“中国第一人”的标准。

三十七年前，我这个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的学生利用大学阶段的第一个暑假去姨外婆生活的湖南宁乡乡村做社会调查。从那时接触，我与姨外婆就开始了高端的接触。那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经过整整三十年低人一等的磨难之后，姨外婆重新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对世界的好奇和对人生的幽默就是她的尊严的特殊标志。每次我们在预约下一回见面的时候，她都会特别提醒

我，以后只要给她带精神食粮，不要再给她带任何仅能饱口福的食品。而大概是七八年前，在第一次向我“炫富”之后，她感叹说如果这些钱早来十年，她就会一个人去“看世界”。她对自己的现状显然不满，说自己现在的生活只不过是“坐以待‘币’”。她接着马上注明出处，告诉我这个幽默出自另外一位百岁老人——她喜欢的冰心先生。

下一次见到姨外婆的时候，我想问她一个这样的问题：当一位94岁的农村妇女走进县城的一家书店买走那一套在书架上摆放了好几年却一直无人问津的《沈从文文集》的时候，她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有可能是创下了一个中国的纪录？七年前，第一次得知姨外婆创下的这个纪录，我就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后来，我也多次在自己的文学讲座里提到这个纪录，许多听众也都非常感动。我相信，这充满乡情和湘情的纪录也一定会感动沈从文先生的在天之灵。

这个中国的纪录令我产生了要以姨外婆为原型写一部小说的冲动。但是，我有太多的问题，我有太多的问题。我的姨外婆出生于湖湘的名门望族。她的母系家庭尤为显赫（她的老外公是著名的乡绅、学者和诗人，还是陈寅恪先生祖父陈宝琛为次子等人聘请的教席以及陈寅恪先生父亲陈三立的挚友。最后，他受热爱洋务的陈宝琛之托，开办水口山铅锌矿，并主持湖南矿务总局，成为湖南矿业的鼻祖）。但是，姨外婆的人生在青春期就开始逆转：首先是她的正规教育被封建的婚姻中断，接着她的日常生活被山乡的巨大颠覆……她一度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没有保证。我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女儿，这个妻子，这个母亲，这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是凭借什么力量保住了旺盛的好奇心和幽默感，进而保住了不可思议的生命力？我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经过了那么多生活的磨难，姨外婆除了抱怨自己的长寿“太不合理”之外，为什么没有其他的抱怨？（毫无疑问，就像好奇心和幽默感一样，“没有抱怨”也是她重要的长寿秘诀。）

我一直觉得作家笔下的人生就像是姨外婆手上的魔方。相应地，写作就是不断翻转魔方的过程，而作品的完成就意味着魔方的六面已经全部对齐，也就意味着作家用合理的叙述完全疏通了现实的乱麻。我希望自己能够找到关于姨外婆经历的所有问题的答案，最终将她的人生变成我的作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一天，我与母亲在长沙街头散步的时候遇到了姨外婆的一位中学同学。她告诉我们，姨外婆少女时代的绰号是“张五百”，因为她三十年代初期在长沙省光中学读初中的时候，五门功课都是满分。现在，姨外婆的年龄也超过了一百了。这是哪怕用百分之百的天才加百分之百的汗水都很难取得的单科成绩。正因为这样，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送给姨外婆一个“张六百”的绰号应该不算“太不合理”吧？



笔会

成熟 (国画) 朱理存

一棵桃树

赵霞

我家侧屋后门有块小小的空地。这方地界实在是小，不过是由隔壁两家猪圈墙围成的一个直角，三四尺见方的样子。外祖父有耐性，用砖头把它的另外两边也圈起来，垫上厚厚一层泥土，成了一处方正的小穴。母鸡们跳到里头，快活地刨食蚯蚓。猫也蹑手蹑脚地走来，腾起蹄子，把它们都吓得够呛。灶房里吃饭剩下的番薯皮、菜帮子，妈妈随手往这里一丢。母鸡啊，猫啊，全都飞快地逃开去，过一会儿，再慢慢地踱回来。

渐渐地，里面长出些稗谷杂草。各种节令里，又不时冒出些不知从哪儿来的小苗，几朵小青菜，一棵大叶青菜，一株似桔非桔的小树，掐掐它的叶子，手上会留下一股冲鼻的辣香。夏天里，我们坐在后门槛上啃西瓜，把西瓜皮和西瓜籽也丢到里面。过些天，西瓜皮长出几茎嫩嫩的西瓜秧，顺着砖墙渐渐爬出来，有的还开起淡黄色的小花，结出指尖大的小瓜。可惜这瓜总撑不大，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它们终于从带上一天掉落下去，藤蔓也都枯萎了。

有一回，从里面长出棵玉米苗，秆子蹭得老高。不久，像模像样地结了两个棒子，都垂着亮闪闪的穗头。我和弟弟一直等到秋天，玉米叶子透出黄意的时候，才把棒子掰下，一层层打开，里头只有一个空空的棒轴。我们不甘心，把玉米的秆子也拔起来，咬一咬，原来都干成了木头纤维，早没有了甜味。

我们爱管它叫后园子，有点自己哄自己的奢侈意思。我家老屋原有个小小的后园，翻新房的时候，旧屋拆除，后园也填作了地基。一年一年，园子后园当什么，总叫人有些兴奋的由头。当然，它们最后都成了过客，只有凤尾蕨沿着披了青苔的砖缝，悄没声儿地长啊长。那一年，从园里头长起来一棵小桃树，大概是谁往那扔过一个桃核儿。这是园子里的新客。但我们对它的熟

情，仅止于把外祖父拉过来，认明了它确是一棵桃树。没有人去管它，它就慢慢自己长着，枝条是那样细而纤弱，叶子是那样软而稀疏。秋风一起，很快吹尽了稀落落的几片桃叶，伶仃剩下的细枝，望去没有一丝生意。我们想着，冬天一过，它的客居生活也该结束了。

不料第二年春初，眼看着枝条渐渐回青，这小而瘦的树苗，又自己绽出芽，发出叶来。母鸡们照例爱到园里盘踞。它们参开肥壮的翅膀，越过砖墙，飞将上去，常把小桃树的枝条扇得折断，又专爱往桃树根下刨食，弄得它愈发纤瘦弱。夏天的下午，西晒的太阳光正照着它，细长的叶子全无生气地蔫垂着，大概撑不过这一年的冬天了吧。

结果又出乎我们的意料。冬天过了，它还好好的长在那里，只是长得那样缓慢，好像总是那副小而干瘦的模样。外公说，这棵桃树，恐怕是个“老不大”。“老不大”是乡下称呼总不长个儿孩子的绰号。下大雨了，雨水敲得桃树枝叶羸弱而剧烈地颤抖。但雨过天晴，它又怯生生地立直在了那里。

“老不大”就那么斑驳的墙角长啊长，有一天，居然长过屋檐，把枝叶从墙头的屋顶上伸了开去。它的叶子仍是稀稀疏疏的，一朝跃出两面围墙的阻隔，亭亭举向天空，忽然有了些顾盼生辉的明丽。就在同一年，它开花了。细细的花蕾，开出来也是细细的几朵粉红，裹在

后，妈妈洗出几个桃，一家人坐下分吃，这才领教了它的好处。糯白粉脆的果肉，殷红坚硬的果核，是我们在乡下没有见过的种子。将果子用力一掰，肉与核完全分离，果肉上印出奇妙的赤色刻纹。

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甜的桃子。此后年年，这个时节里，我们都能吃到从桃树上采摘的果子，不多不少，总是那样一篮。收桃的这一天，简直是我们的节日。因为从不修剪的缘故，桃树的枝条伸得越来越高，到了后来，爸爸索性把梯子横架到树身上，一手攀着树干，一手小心地往上探摘，那装桃的篮子就悬挑在树杈中央。

瞧，这桃树，它是什么时候长成这样粗壮健硕的！那一篮桃子，是我们记忆里年年夏天甜蜜尾巴。直吃到有一天，它的枝叶又稀疏起来，果子也渐渐减少。从桃树干上沁出来大团黄色的桃油，越来越多的虫子聚集到这里。我们明白，它已成了一颗老桃树。

又一年春天，它的叶子几乎给洋辣毛虫食了。爸爸拿斧子把桃树拦腰斩断，清理了随时会掉下来的虫尸。这下，园子里只剩了一个乌黑的桃木桩子。桩子上不再发出新芽。太阳晒，雨水淋，没过多久，它就朽坏倒下了。我们把前些年晒干留着的几枚殷红的桃核儿埋到园子里，认真地给它们浇水，施肥。里头一有小苗冒出来，我们就跑去看，是不是我们种下的桃核儿发芽了。

可惜那里没有再长出来一棵桃树。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了桃树的小园子，又恢复了早年的模样，虽有小小的热闹，未免空荡荡的。外祖父往里头移栽了一颗石榴树，年年开花，并不结果，却是越长越大。有时候，刹那的出神，会把石榴树的大影子看成那一年的桃树。醒过神来，一时也恍惚了——那里真有过一棵桃树吗？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